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二六七）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四三二期 ——
（二〇〇五年五月十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505b）

【难忘岁月】生活在无限恐惧之中
【往事如烟】毛泽东逝世岁月亲历记

韩杰生
楚文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难忘岁月】

生活在无限恐惧之中

• 韩杰生 •

◇ 仇恨狂泄，鬼哭神泣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写信，对他们的打砸抢抓斗行动“表示热烈的支持”，并说：“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

18日，毛和林彪在天安门接见百万群众和红卫兵，提出“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打倒牛鬼蛇神”。此后，全国红卫兵滥揪滥斗、打砸抢抄杀达到了疯狂的程度。

八月底九月初的一天，我和同事从地处北京玉泉路的科技大学骑车去中关村，在回家的路上，突然看到远处有长长的一溜人走在人行道上，每两个红卫兵装束的小青年喷气式地架着一个长者。每个被架的人，头上戴着一顶纸糊的高帽子，胸前挂着一个大硬纸牌子。帽子和牌子上都写着（反动政治头衔）某某某，在名字上用红笔画出大叉叉。显然，这是一个中学的学生们，揪斗他们的校长和老师，游街示众。为了看看这些红卫兵到底如何处置他们的老师，我和同事也尾随着这一列队进入他们的校园。这是一所主要招收部队干部子弟的中学，校园优美，

地域很大。一进学校大门，不远就是一个可容纳数千人的大操场，操场一侧有个相当大的砖砌的看台。台的前方巨大横幅上写着：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左右两边竖幅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操场中央已经聚集了近千名学生，多数是红卫兵装束，即草绿的军装军帽，腰束皮带，臂佩红袖章，胸戴毛像章。这种装束是无尚政治荣誉：毛的捍卫者、红后代、造反英雄。有这种装束的多半是部队干部子弟。

被揪斗的老师顺序排在台前方，面朝学生，一字排开，共有二十多人。在这同时，从各个教室里又陆续出来好几百学生，多是普通的服装，陆续集合到操场上。

台上的一个红卫兵，手持红小书，在讲坛的麦克风前宣布：批斗大会开始。看上去他是红卫兵什么造反兵团的司令。首先，这位司令带领大家高声朗读最高指示：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一切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跑掉。”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红色恐怖万岁！”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谁敢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

随后，他以激扬的声调说：“红卫兵战士们，同学们，我们能够允许那些走资派、保皇派、反动权威、牛鬼蛇神，霸占我们学校、玷污我们的红色阵地吗？”

下面一致高喊：“不能！”

“那我们该怎么办？”司令问。

“揪出来，斗倒斗臭！”“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砸烂他们的狗头！”台下的红卫兵一片狂叫。

“好，现在就把他们揪到台上来示众。”

司令点一名字，就押上台一个人，同时台下就高呼革命口号。

“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X X X，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毒害青少年，罪恶昭著。”该校校长第一个被押上台。两个红卫兵一手抓住校长的衣领，一手反剪住两臂，架到台前左侧。一声“跪下”命令，校长就被按倒在地。

“反动学术权威X X X，专给帝王将相树碑立传，以反动学术权威篡得副校长，打进革命队伍。”押上来的是一个年轻壮实的男子。此人北师大毕业，毕业论文发表在《史哲杂志》上，很受学界赏识。“跪下”命令之后，他仍挺直腰站立不动，身后的一个脚穿大皮靴的高个红卫兵，猛地一脚踹在他后腿上，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很快他的浅色裤腿就印出殷红的鲜血。

“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X X X，伪装进步，骗取优秀教师称号，是钻进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十分危险的牛鬼蛇神。”押上来一个中年妇女。或许是因为长时间弯腰难以坚持，或许是不愿忍受人格的屈辱，她走上台后，双手挣脱了红卫兵的架持，直起腰来。结果，被两个手执铜头皮带的红卫兵搂头抽了两鞭子，顿时脸上流出鲜血，尖利的惨叫刺人心脾，回荡在校园上空。

“保皇派X X X，虽然出身城市贫民，但顽固抗拒毛主席革命路线，革命小将批斗走资派，他就如丧考妣，是十足的阶级叛徒。”一个上了岁数的瘦弱的男子被押上台。由于长时间被喷气式架持，体力不支，走上台就瘫倒在地。红卫兵在后面猛踢两脚，命令到：“起来，不许装死，

癞皮狗！”然后被两个红卫兵提着衣领站起来，跌跌撞撞地被架到第四位置跪下。

二十几个被揪斗的人，一个一个叫到台上跪下。凡不愿跪下的，都要吃上几皮靴踹踏。凡有挣扎者，上台都要吃上两皮带。红卫兵学生个个凶杀如阎王，被揪斗的老师如临刑场。台上抽打尖叫，台下口号震天。其恐怖肃杀气氛，五十年代初镇反除霸的场面还要逊色许多。我不知道在这些青少年的头脑中如何根植了如此强烈的仇恨，而且是直接面对循循教导他们的师长。可以肯定，这种仇恨决不是他们的天生人性，而外在的注入为什么会如此迅速地膨胀发酵？

司令开始命令：“现在，让这些坏蛋交待他们的罪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不老实，小心你们的狗头。现在从走资派X X X开始。”

两个红卫兵把校长提溜起来，押到麦克风前，命令：“说！”

校长弓腰把咀凑近麦克风说：“我不自觉地执行了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我执行的都是北京市教育局的指示。至于——”还未等他把话说完，背后的几个手执铜头皮带的红卫兵抢着向他身上猛抽过来，一面大声说：“北京市是彭真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你不知道吗？”“你不自觉，现在我让你自觉！”“谁敢顽抗，就叫他灭亡。”

校长被打得满脸满身鲜血渗出，眼镜飞落甩破，连高帽子也被打碎。一阵抽打之后，司令再次命令：“说，你犯了什么罪。”“我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毒害青少年，我有罪，罪大恶极。”两个红卫兵掀起他的衣领，拧住他的手臂，把他架到原处跪下。

接着副校长被架到麦克风前。

“我是钻进革命队伍的反动学术权威，专门为帝王将相树碑立传，专门为才子佳人招魂，是十足的封建余孽，罪行累累，死有余辜。”他接受前者的教训，尽量把自己说得严重，骂得狗血喷头，借此望免吃皮鞭之苦，反正以后不会由这些红卫兵来定案。结果，那些急不可待要施展威力的红卫兵们，还是猛力地抽打他，一面打一面说：“我让你给帝王将相树碑立传”，“我让你给才子佳人招魂”，“我叫你这个封建余孽尝尝无产阶级的铁拳”。结果也是被打得皮开肉绽，血迹斑斑。

被称牛鬼蛇神的中年教师第三个受命认罪。麦克风传出她清脆的声音：“红卫兵小将们，我来说两句心里话。我在学校是老师，在家是母亲，我的孩子和你们是同龄人。出身不是我自己能够选择的，如果你们的母亲这样被斗被打，你们会如何想。将人心比——”没有等她话说完，一皮鞭从背后打来。一声尖叫划过长空。接着数名红卫兵猛力抽打过来，并厉声斥责：“谁让你放毒！”“亲不亲，线上分。”“想用资产阶级的人情来收买我们，没门！”当场这位老师就被打瘫在地，爬不起来了。两个红卫兵硬是把她拖到原来下跪的地方，让她躺在那里。

第四个被叫去认罪的是保皇派X X X。看上去，他的年龄可以做这些红卫兵的爷爷，可那战战兢兢的样子真好像小鬼见阎王。他不无冤屈地说：“我只不过是办公室的一个职员，而且很快要退休了。我只是想维护教学秩序，不影响大家学习，客观上抗拒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的话音刚落，一个猛力的皮鞭从背后打来，当时就把他打倒在地。一红卫兵大声斥责：“你还在为自己辩护！”随后又是几鞭子抽打后，两个红卫兵把他拖到原位，像扔死狗一样扔在那里。

接下来的一个一个认罪表态，没有一个人再敢于为自己少许辩解，或敢于否认红卫兵司令给他们定的头衔和罪状，多数都是给自己无限上纲，加大罪名，痛骂自责。即使如此，几呼没有人没遭到毒打。有的被打得鲜血染红了衣裤，有的被打得血流一地，有的被打得瘫地不能爬

起，有的被打得生命垂危。其中有一个妇女，所谓的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被打得特别重，开始时还听到他的求饶和惨叫声，后来什么叫声也没有了，估计是被当场打死。但会议主持人还说：“别管它，这个狗崽子装死”，叫人把她拖到原来位置扔到地上，接着叫下一个人。

现场真是一片血腥恐怖、惨无人道，令人听之毛骨悚然，见之不寒而栗。

自从那天以后，直至今日，我的脑子里每每萦绕这样的问题：如果在这些红卫兵青少年手中有大刀和枪械，他们去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决不会比南京大屠杀中的日本士兵逊色；如果他们掌握着毒气室的生杀大权，他们决不会比希特勒的党卫军手软。这是为什么？这样罪恶的人性是如何练就出来的？如此仇恨的烈火是如何点燃起来的？人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究竟在什么条件下可以让人的恶性如此膨胀？究竟谁能够点燃如此剧烈仇恨的火焰？人类历史上的重大悲剧是不是很容易重演？

那些红卫兵小将，都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父兄多是打江山坐江山的“英雄”，他们自许血管中流着高贵的血液，他们细胞中根植了优越的基因。就像希特勒点燃大日尔曼人对犹太人的仇恨烈火一样，毛泽东轻而易举地可以点燃这些强烈优越感的“好汉”们心中肆掠和仇恨的种子。我想，如果当年老毛连续八次所接见的一千多万红卫兵不是把矛头指向国内，而是指向苏修和美帝，要他们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处于水深火热的受苦受难的人民”，今天的世界又会是什么样？

今天，那些具有扭曲了的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愤青”们难道就不会像三十多年以前的红卫兵们那样行事吗？血染的历史、苦难的经历对于这些青少年们终究成了遥远的过去。共产党一手遮天，掩盖历史，青少年们永远是“一张白纸”。这些“愤青”仍然是共产党手中威力无比的原子弹，一旦他们需要时，他们可以把这种原子弹扔到世界任何地方。善良的人们，要警惕啊！

◇ 便池浸老师，锅炉焚尸体

两天之后，我和同事在下班的路上，顺道再一次来到这所中学。一则是看看那些红卫兵如何处置上次大会上批斗的校长老师们；再则，听说这所学校破坏得很厉害，看看情况到底怎么样。然而，这次我们在校园内看到的是一派冷冷清清、颓废杂乱、破败不堪的景象，偶尔遇到几个成年人，青少年学生几乎一个没有见到。

穿过操场，走近一排平房教室的后墙。墙上残存一些斑斑渍渍、支离破碎的旧大字报。但走到墙壁端头，有一张四开的新大字报纸，上面只写着一句话：看看狗崽子的下场。下面画了一个箭头，指向校园的深处。我们沿着箭头所指方向走到头，看到一个半开放式的公共厕所，远远就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已经来到这里，总想看个究竟。我们支起了自行车，走进厕所。这是一所旧式的公共男厕，小便池是个约三米长、一尺宽、一尺深的统池。进门后，我们一眼就看到小便池中躺着一个死人。死者是个四十岁上下的妇女，很可能是前天在批斗会上被打死的那位出身不好的老师。她的头脸、双臂和双脚等外露部分可以看出，由于小便的浸泡，已经肿大、发白，浅色的衣裤处处浸润着冲淡了的血迹，那黑红色的条条伤痕处处可见，其情景实在是惨不忍睹。人死了还要遭如此野蛮虐待，真是不可想象。由于天气比较炎热，显然尸体很快就要腐烂。很可能其家属还不知道这一惨剧的发生，或者是知道了而不敢来此收尸。

我们走出公厕，心情不是滋味。同事问了一句：“这些青少年怎么这么残忍？”我无以对答，无意地说了一句：“人之初，性本恶”。他很当真地说道：“不对，在文革前决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当然无以反驳。可以千真万确地说，即使“人之初，性本恶”，也不会恶到如此程度。

我们推上自行车，正准备离开这里，走来一个工友模样的中年男子。我走向前去问他：死了的老师为什么没有人收尸？学校为什么这样冷冷清清？前天那些被斗的老师怎样处理的？他说，学校的职工已经通知了家属，大概是家属不敢来收尸吧。红卫兵们说，要到全国去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风，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因此都一窝蜂地出去大串联了。昨天他们把专政队的人全放回家了。不过放之前又打死了好几个。他用手指向一个大烟囱说：“他们把尸体还扔在锅炉房里，要求锅炉工烧掉。现在供暖的大锅炉还没起火，烧开水的小锅炉怎么可能烧尸！”

我们骑车来到大烟囱处，支起自行车，走进锅炉房里。一进门就看到有四具尸体躺在离大门很近的墙角。死者三男一女，年龄看上去都是三十至五十岁的中年人。个个伤痕累累，血迹斑斑，脸上伤残无一处完好，身上衣裤无一片无血。每个人的双手在身后被绳子绑死，男的被剃成鸳鸯头，女的头发被打成结（可能是为了吊起她）。可以看出，死者在断气之前受尽了虐待狂们难以想象的折磨。这种毫无人性的虐待狂，也只有人才能做得出来，任何凶残的野兽都是望尘莫及的。

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锅炉房。同事发自内心地说：“这太可怕了！”我也深深感触地说：“这种可怕的情景很快就要扩展到全国了。”也许我们都分别想到自己的老师、亲友和乡亲们，双双都不寒而栗，默默互视，心照不宣。

不远处，在一座礼堂的端墙上贴有一些新大字报，我们推着自行车走过去浏览了一下。大部分大字报都是某某城市告急，某某省造反派受压，某某保皇派反攻倒算，呼吁这些在毛身边的革命先锋小将们赶快奔赴革命前线，支援造反派。

另外有一篇激情洋溢的“革命”诗，很有代表性，这里抄录如下。

题目是：看今朝，全凭革命小将

把黑五类永远送进坟场，
把狗崽子高高挂上屋梁。
挖掉藏污纳垢的校园墙，
砸烂禁锢革命者的门窗。
捣毁桌椅、黑板和讲台，
消灭传播封资修的课堂。
打破反革命的条条框框，
铲除滋生修正主义的温床。
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
看今朝，全凭革命小将。
把革命的烈火烧遍全中国，
让革命的红旗全世界飘扬。

该校的建筑多是平房，地域很大。我们骑自行车沿着教学区转了一圈。所到之处，门窗玻璃没有一块没被打碎，没有一块黑板没被砸破，大部分讲台被拆毁，大部分门扇被毁坏，相当多的桌椅被砸得断胳膊断腿，连很多教室屋顶前排的飞檐都被捣毁，教室墙壁被墨迹和污物图得不堪入目，室外花坛里的花卉都被连根拔去，花盆被打碎，花桶被倾覆，学校的围墙也有数处被挖出大缺口，砖头碎石散落遍地。

后来我们来到校园内的唯一一座楼房，学校的行政办公楼。楼内的桌椅板凳等家具也是一应破坏殆尽，凡是有玻璃的地方没有一块完好，墙上的挂钟被砸烂，老师用的暖瓶、水杯打得粉碎，地下散满了教科书、笔记本、墨水瓶，墙上到处用墨汁刷写了打倒X X X的大标语。比我小时候刚刚记事时所留下的日本兵烧杀掳掠之后的场景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说，室内没有一物一处完好，除了毛的一尊石膏像，墙上没有一方一片洁净，除了悬挂毛像的那一小块地方。

毛啊毛，全世界都砸得稀巴烂，你那完好的一隅还觉得干净舒服吗？所有精神文明的继承者和开拓者统统都打倒，你一个人还能安全吗？难怪毛的晚年日夜疑神疑鬼，一周数易其居所，惶惶不可终日。恐怕这也是自作自受吧！

◇ 铁血耆残，以命请罪

六六年秋冬，中学红卫兵的抄家揪斗风暴发展到大学。当时包括物理系和化学系高年级的中国科技大学一分部，地处中关村科学院深墙大院的避风港里。教师多是科学院对应研究所里的专家们兼任。专职教员多是像我这样的年轻教师，由于涉世和家庭等原因，文革中大多比较安分。可是当学生们全国大串联回校后，六六年冬，在这小小的避风港里，安静的气氛也被彻底打破了，“革命”的风暴卷起了重重浪。

一分部主任赫X X，物理系总支书记李X X，系主任黄X X，化学系总支书记和系主任，不分青红皂白，统统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多次被揪斗，反覆遭批判。

一天，西北风呼啸，大雪纷飞，天气十分寒冷。分部批斗会又一次在职工食堂举行。那时这个食堂只是一个简陋的临时建筑，没有桌椅，没有讲台，没有供暖设备，只有一个砖砌的烧炭火的大炉子置于中央。

批斗会开始，一分部的五个领导人，一个个头戴高帽、胸挂大牌，喷气式地被架到会场。批斗会一次次升级，被批判的人起初可以坐着，其后要站立，再后喷气式，这次就要求跪地。下跪与其说是体罚，不如说是人格侮辱。这些人官虽不大，但一贯被师生们称为书记、主任，处于尊敬恭维的环境之中，对这样的侮辱当然是难以接受的，于是就要大吃皮肉之苦。

分部主任赫X X，已是上了年岁的人，但体格壮实。当听到‘跪下’命令时，他没有顺从，而且站得格外挺直。他说：“搞体罚不是毛主席革命路线。毛主席一贯主张要文斗，不要武斗。”背后一个大汉猛地一皮靴踹到他的后腿上，结果他没有站稳，全身突地趴倒在地，高帽子也摔出好远。两个架持的人抓住衣领把他提溜起来，他的两个门牙被磕断，嘴角不断地流出鲜血。然而，这位主任是个硬骨头，他站立起来，仍然拒绝下跪。并且说：“中学红卫兵小将，由于他们年幼、激情，搞体罚，现在也被制止。你们是大学师生，不应该再搞体罚。”这时，突然从人群中出来一个满身横肉的年轻人，此人是职工食堂的炊事员。他从煤炭炉中拿起一根烧红了的捅火棍，朝着前边走来。这样的场面，虽然对于在全国大串联中见过大世面的学生们，已经习以为常了，但就在眼前这样近距离即将发生的血腥惨剧，还是感到胆寒。我心中深深地为他捏着一把汗。

“快跪下！”群众中突然有个女声高喊。这时，整个大厅内的空气都十分凝滞而肃杀。幸好，背后又是一脚踹去，这个赫主任才应声跪下。就这样，避免了一次现场火刑的血腥场面。

系主任黄X X，是个小儿麻痹症遗迹很严重的残疾人，一只腿细得像麻秸，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可是那些红卫兵干将们、革命大左派们，对于这样一个弱者、残者也毫不手软。他们罚他跪下，还未来得及动作就有一皮靴踹来，我真担心他的那条细腿被踹断。他猛地跪倒地下，

瘦削的膝盖骨磕撞到水泥地上发出沉闷的响声，痛苦感和受辱感阵阵掠过他的脸颊。在整个批斗会期间，他的身体一直在打颤，额头上渗出大汗珠不断滴到地下。看上去是在咬牙坚持，随时都有栽倒地下的可能。

系总支书记李X X，在没有听到红卫兵的命令之前就主动跪下。由于他有个大的肚子，个头也比较大，直挺挺跪在那里，似乎还有些不服屈辱。结果，还是背上被踹了一脚，这才低头弓腰，爬在地上。

化学系总支书记和系主任看此情形，当然都乖乖跪下，弓腰爬地。

批判会的发言，尽管每一个被批斗的人都有分别的揭发和批判，但都是一些大同小异的说辞。共同的、突出的，不外乎如下几点内容：

一，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

按照当时权威的批判（张春桥语）：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培养出来的人，学农业的不会种田，学数学的不会打算盘，学建筑的不会盖猪圈，学机械的不会开拖拉机。我不知道这些声嘶力竭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人，是否就乐意去种田、打算盘、盖猪圈、开拖拉机，或者说他们就是认为上大学就是要学这些东西，而且靠这些本事就可以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二，执行专家路线，将无产阶级教育阵地拱手让给资产阶级专家。

“专家路线”无非就是指请研究所里的专家来为学生上课。凡专家都是资产阶级的，所以只能由工人、贫农或实验员来给大学生上课。不过，如果安排经验丰富的实验员和研究员同时上课，那些批判声调最高的人只会选研究员的课，而决不会选实验员的课。

三，执行资产阶级阶人事路线，教师队伍中搜罗大批出身地富反坏右的人。

中国科技大学是在大跃进的五八年成立。为了快速、高效建起高水平的一流大学，从五八年到六二年从北大、清华两校招收了大量的优秀应届毕业生，其中有些人出身“黑五类”。实际上，这批人是中国科大高水平、高速度的建校功臣。在文革的“出身论”风潮中，这也成了学校大小当权派的罪状之一。

四，重专轻红，又红又专的学生受到排挤。

所谓又红又专的学生主要是指学生中的党团干部。这些人一般学习较费力，多数情况下老师都给以更多的辅导。然而一考试这些人多是落在后头，这就是排挤了又红又专的学生。这种以“革命”名义的批判，最后导出张铁生交白卷的大英雄。

批斗会开了两个小时。散会时，被批斗的“走资派”一个个爬在地上都无法站起来了。几个好心的人把他们慢慢搀扶起来。经过好长一段时间的恢复，他们才弓着腰一瘸一拐地离去。然而，患有小儿麻痹症的黄X X完全无法自己行走了。我和另外一个教师把他架到附近的教师集体宿舍休息。

半个小时之后，有人找来了一付杵拐。黄X X正准备拄拐回家，有个同事从教学楼回来说，赫X X从他的四楼办公室窗户跳楼自杀了。

大家都很震惊。黄叹息地说：“哎，何苦呢！又落个自绝于党、自觉于人民的罪状，子女要为此背一辈子黑锅。”

同事说，他在他的办公室留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我执行了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我向党、向革命师生请罪”。

我不知道，这张请罪的纸条是否可以免掉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罪状，以及他的后代要背的黑锅。共产党的邪恶由此可见一斑，人被逼走上绝路，它还要让你罪加一等，让死者的家属和后代背负一辈子黑锅。

◇ 敌敌畏要喝大瓶

六八年夏秋，文化大革命中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全面展开，揭发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黑云摧城，来势凶猛。

所谓清理阶级队伍，实际上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达到主要目标——打倒刘少奇之后，把一时难以控制的群众“革命”狂热，引导到群众斗群众的路上去。首先是老问题当新问题炒回锅，即把过去已经查过、定案过、做过结论或戴过帽子的人，再翻出来审查批判，就已有的线索再深挖细找，或威逼诱供，死猫当活老虎打。清队的早先阶段的主要矛头就是指向‘有问题’的教职员和其他知识分子。

在清队运动中，革命派的党员有权查看他人的档案。根据档案里的材料，他们就可以射出一排一排有杀伤力的炮弹（原来，个人的档案材料只能组织掌握，不会向群众公布），对过去历次运动中的受害者进行再次恐吓和迫害。

一天，大教研室的原党支部书记石XX贴出一张大字报，题目是：《张敏修必须老实交待》。主要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

- 1，要求她交待家庭中有哪些人有政治问题，有哪些罪行？她是如何和他们划清界线的？
- 2，要求她交代自己有哪些政治问题，以及她的朋友和熟人中有那些人有政治问题。
- 3，追问她过去和右派分子XX是什么关系（谈过恋爱）？现在是否还有什么联系？
- 4，追查她是否是在四清中怀孕，怎么怀孕的？她和丈夫何时何地会面的？是否向四清工作队领导汇报过？

问题1和2，在过去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检查中都是反复汇报过的。问题3和4完全是其个人的私生活，但在那个年代人们是没有任何‘隐私权’的。

第二天早晨，教研室召开对张敏修的揭发批判会。二十多个教职员都到齐，就是张迟迟没有出席。会议主持人派人去女教师集体宿舍寻找。过了相当长的时间，派去寻找的人回来报告，张敏修躺在通向楼顶的楼梯里，已经奄奄一息。揭发批判会不得不收场。主事人找了几个，把张抬到校医院。在那里几乎没有进行任何处理，很快她就断气了。

事后，有张的同宿舍人说，在天刚蒙蒙亮时见她出去，以为她去上厕所。估计她在夜间喝下敌敌畏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很难煎熬，天刚亮时爬向楼顶，可能是想跳楼来早些结束生命，但未到楼顶之前已经再也爬行不动了。

由于张的丈夫陈XX和我的妻子是同一个单位，且都住在中关村，电话打到单位没有找到

陈，头头就派我骑车去陈家，通知他来学校处理后事。我找到陈家，他正在服侍一个一岁多的小孩子。由于孩子生病，单位日托不能接收，他只好请假在家照顾。

我把张敏修的事向他说出，他受了很大的震动。他呆呆地站立在那里，半天不语，直到坐在床上的孩子伸手哇哇叫起来。在他喂食孩子的时候，我把头天石XX的大字报内容和他说了。直到喂完孩子，他擒着眼泪跟我说：张的怀孕在下乡四清之前就有了；大学中的事她都向组织汇报过；至于她的亲友中的政治问题，也都早已向组织说清楚。

由此可见，张的自杀完全是政治高压和精神恐吓所造成的，是没有任何‘油水’可供炒作的。不过，这种或由于维护个人尊严，或由于精神过于脆弱而在清队初期而自杀的人，不计其数。一定数量的死人，这是党的需要。以此维持高度恐怖的政治气候，才能让那邪灵为所欲为而没有反抗。何况这种让人自己去死亡的办法，共产党既不要担负杀人的名声，还可以给人加一条‘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新罪名，因而‘死有余辜’，死者的家属因而也自背黑锅。

清队运动期间，学校进驻了军宣队。为集中有效的搞运动，军宣队要求每一个职工都要住学校集体宿舍。集体宿舍的双层木床臭虫泛滥，学校后勤部门每年夏天都要向各个基层单位发放灭虫用的敌敌畏。敌敌畏是强烈杀虫剂，一般，二、三十毫升就可以使人致命。这正好给人们提供了一种自杀的方便而有效的手段。

掌握校系领导权的军代们，一入校就发动学生和‘左派’教职员，向有出身和历史问题的教职员展开猛烈的攻势，鸡毛当令箭，蒜皮当炮弹，无中生有，鸡蛋里挑骨头，要把这些人通通揪出来。政治高压釜迅速升温，斗争气氛咄咄逼人，不到两周时间，学校就发生了好几起喝敌敌畏自杀事件。

两周后的星期六，军宣队再次召开全校动员大会，要进一步掀起清理阶级队伍的新高潮。军宣队队长在动员报告中说到自杀问题时说：“任何人要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我们不会去阻拦。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如果喝敌敌畏，就要喝大瓶，小瓶子分量不够，半死不活会给你的家人和同事带来麻烦。需要者我们可以充分供应。”

当时，瓶装敌敌畏，小瓶的20cc，大瓶的500cc，也许喝上一小瓶还不至于立刻死亡，所以军宣队队长建议人喝大瓶，可以死得干净彻底。

毛的‘革命路线’就是要把“阶级敌人”在生前斗倒斗臭，死后丧尽人格。让他们喝敌敌畏而死，死得卑微而可耻，就像杀死臭虫一样，死而遗臭。如果说，法西斯消灭他所不喜欢的人是技术性的、简单的消灭肉体、消灭价值。而共产党消灭人，不仅要消灭人的肉体，还有把这一肉体变成肥料，以供他人吸取‘营养’；不仅要消灭人的正面价值，而且要强加给你负面的价值，使你死后还要负罪。

整个清队运动，科技大学的三百多个教职员中就有十几个人自杀。除了两个跳楼、一个跳水、一个卧轨、一个服安眠药（文革中能用安眠药自尽是一种“特权”，大多数自杀者是没有办法获得的），其余都是喝敌敌畏而自杀。这就是军宣队充分供应敌敌畏的成果。

◇ 病榻上的审问

文化大革命中的清理阶级队伍如火如荼。一个周一早晨，我正准备骑车去玉泉路科技大学本部上班，突然急性发作小肠疝气。妻子陪我进了中关村医院。医生决定要即行做手术，我被从急症室直接送到手术室。在打过麻药针之候，我很快就失去了知觉。手术后，我在病榻上逐

渐苏醒过来，模糊看到有两个人坐在我的床边，继而定睛认出，他们是我的教研室两个同事，谢X X和吴X X。我感到一阵温暖，尤生感激之情。心想，清队形势严峻，我也挨了大字报，同事们还是很讲情谊的。我嘴唇蠕动一下，想说点什么。没有等我开口，他们就直言说明来意：“我们是受军宣队委托，来和你核实一些事实。”我顿时心生悲凉，这才明白，为什么我的妻子术后反而不在身边，想必是他们要求她离开的。

谢和吴各拿着一个小本本。谢翻开本本开始向我问话，吴翻开本本拿，拿出圆珠笔准备纪录。就这样，手术后刚醒的病榻审问开始了。

谢开始交待政策说：“军宣队对这次清队指示要做到三清：个人历史清，家庭情况清，社会关系清。并说，自己交待比别人揭发好，早交待比晚交待好。另外，党的政策你是知道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要竹筒倒豆子，干净彻底。”

我说：“我会一切据实说来，你们有怀疑可以内查外调。如果证实我说的是假话，一切后果我自己负责。”

他停了一下，小本子翻了一页，接着说：“现在有如下一一些问题，组织上要搞清，请你逐一回答。一，你舅舅是什么人？他六七年夏到你家干什么？”

“我舅舅现任广西文联副主席。他是三八式老干部，十五岁去延安进鲁艺。去年夏天，他因参加广西保韦国清的南宁联指，在两派武斗中被南宁4 2 2抄家追捕，逃到北京。现在南宁问题已经明朗，中央‘七三布告’定广西4 2 2为反革命组织，舅舅也早已回广西。”

“二，你弟弟是什么人？他到越南去干什么？”

“我弟弟是北京市运输局的工程师。他是到云南去支边，不是到越南。”

“三，你是如何向四清工作队请假回城的？”

“我向四清工作队请假，队长批准我一周假期，原因有二：一是因为我爱人首次妊娠，反应强烈，我需要回去照顾一下；二是我弟弟要去云南支边，我回去帮助他作个安排，并替他送行（当时弟弟尚未结婚）。也可能是，当时四清工作队队长把‘云南支边’误听为‘越南支前’了。”

“四，你和朱X X是如何勾结的，你们结婚是经过谁批准的？”

“没有勾结，我们是大学同学。我在科技大学行政处开了证明，我爱人在物理所开了证明，然后到北京市指定机关登记领取结婚证的。”

“你们向组织汇报没有？”

“我已超年退团，朱是开除出团。我们都不是党员，不知道结婚要向组织汇报。”

“平常是不需要，但现在是阶级斗争剧烈的非常时期，我们要随时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我无话可说。

“五，去年夏天你家里窝藏了什么？”

“我们住的楼房单元，有三间房，三家人，总共十一口，六个大人，五个小孩，共用一个厨房和厕所。我们家房间最小，只有九平方米，夫妻两人一个小孩，不可能窝藏什么人。也许是这么一件事：一个暴风雨的中午，一个在体委工作的朋友，只穿一件裤衩和背心，全身淋得透湿，突然来找我。当时是中午下班时间，门洞里的邻居阶级觉悟高，大家都在搜索阶级斗争新动向，所以看到这样一个奇怪的陌生人，就报给‘组织’了。我这个朋友是在体委两派武斗时逃出来的。后来他到清华的一个朋友那里过了几天，很快就回去了。”

“体委的朋友叫什么？干什么的？”

“韦X X，是《体育报》编辑。”

“现在阶级斗争复杂，看一切人一切事，都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以后有人到你家要向组织报告。”

“.....”

“六，你和你的同学徐X X（右派）是什么关系？现在还有什么联系？”

“他是我大学时的同班同学，现在没有什么联系，六0年他已经死了。”

“七，你和你父母亲有哪些联系？他们现在做什么？”

“父亲已于六零年去世。母亲退職在家，抚养一个小弟弟。我每月给她寄去二十元生活费。”

“八，在你的亲戚、朋友、同学、同事中有那些有问题的人？你和他们还有什么联系？”

“‘有问题’具体指什么？”

“有问题就是指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

“我的家庭和社会关系中有问题的都是右派。家庭中有：父亲、母亲、堂哥、堂弟、姑父、姑母。同学中有谢X X，刘X X，徐X X，闻X，王X X，周X，刘X X，曹X X，谢X X，蒋X X，姜X，.....”

没有等我说完，谢打断我的话：“好了，好了，这足以说明你是出生在右派的家庭，学习在右派的学校，生活在右派的窝里。”

我心想，一个人站到了左的极端，其他人可不都是右了吗！说不定那一天你也会变成‘右派’呢！果不出我所料，到了清队的后期，谢X X和吴X X也都成了审查的对象。

“那你和这些人还有什么联系？”

“父亲、姑父、堂哥已经死亡，除母亲之外，其他亲戚都无联系。同学中有一些人死了，活着的人都没有联系。”

审问到此结束。两天后，妻子来医院看望时告诉我，昨天，我单位来了三四个人抄家，九平方米的房间、过道、厨房和厕所，拐拐角角、里里外外翻了个遍，一无所获。

实际上，我们一开始就预感到，‘清队’就是冲着所谓‘有问题’的人来的。所以我们已经把家中的信件、照片和所有书写的文字材料全部销毁了。

虽然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东西，但是在那个年头，一句话、一张照片、一件纪念品都可能成为定你反革命的罪证。因此一切文字、一切照片、一切纪念品最好都统统销毁。不过销毁材料千万要小心，被人发现了就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尽管我们的东西很少，如何销毁确也伤了一番脑筋。在马桶冲掉或点火烧掉，很容易被单元内邻居发现；拿到锅炉房焚烧，会被工人发现；到野外焚烧或扔到水里，都会留下痕迹。最后，我们把这些材料一张一张撕成小碎片，每一次上厕所冲掉一些，多日、分散地完成了这项任务。

这次彻底的销毁材料，也给我带来了一个终生的遗憾。到了父亲、母亲平反之后，我想找出他们的一张遗像或一份手书作为纪念再也不可能了。

两个礼拜之后，我出院回单位上班。在同在一起政治学习的同事，互相见面，个个冷若冰霜。人际之间没有亲情，没有友谊，连起码的人道关怀也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人人自危，尔备我防。

经过了内查外调，查三代，挖祖根，清关系，理联系，穷追只言片语，深究蛛丝马迹，折

腾了一个多月，结果未搞出任何名堂，不得已而不了了之。

感谢运动，清队中我倒是练就了一付恐吓无惧、软硬不吃、皮厚少羞、茧老无痛的铁石本领。我决不会自己去寻短，也不会去输诚自残、出卖人格，更不会顺着杆子爬，去坑害别人。我起码要保留住心灵深处的一块人格尊严的净土，不至在以后的岁月为历史背上沉重的包袱。

◇ 挚友输诚，负罪八载

清队中，抓死猫当活虎打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借旧账挖出新“罪行”，凭老问题抓出新“敌情”。这是共产党整人和维持斗争的手段之一。

我们教研室中有一位年轻女教师施XX，虽家庭出身不好，可一贯对党组织积极靠拢、努力进步、争取入党。可是，在那个血统论甚嚣尘上、动不动就要查三代的年代，这些出身不好的人想入党，不过是剃头挑子，一头热而已。施女士尽管积极靠拢党组织，主动汇报思想，清队早期还是免不了成为运动的矛头所向。

在一次全校动员大会之后，教研室三结合领导小组中的造反派头头李XX贴出大字报，矛头独指施XX，其内容有二：一，责问她，是否彻底与家庭划清了界线，是否彻底揭发交待了家庭的‘罪恶’；二，要求她以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检查她所涉及的一切人和事，交待揭发阶级斗争新动向。

施的为人甚为单纯幼稚，对‘组织’更是襟怀坦白，毫无隐瞒。当天她就去找领导小组汇报思想。对家庭的认识已是老生常谈，不知汇报多少次了。对于‘组织’有兴趣的事，她报告了一项阶级斗争新动向。这一‘新动向’就是她的一个至诚密友朱XX向她讲了一些江青的小道消息。

传播江青的小道消息，属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可是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于是第二天，大字报的猛烈炮火对准朱XX，发动了强大攻势，要她老实交待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大罪行。

朱是个老练持重的人，她知道事发是由于施向组织的汇报，没法再隐瞒了。于是她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知道的一些小道消息，一一向当时的领导小组交待了。从此，朱开始挣扎在无休止的逼迫交待、检查认罪、人格屈辱和肉体苦难的折磨之中，不分辨事实，不允许辩解，不可能申诉，承受着人格尊严的践踏和残酷的人身折磨。

第一次对朱的揭发批判会，主要是由领导小组成员发言。他们反复交待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穷追不舍，要求朱彻底交待尚未交待的问题。他们反复强调，江青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江青就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可是在揭发批判会上，他们就是不说出朱是如何攻击江青的。原因是，攻击江青的言论说出来就是扩散，就有损于江青的光辉形象。可是，不说出‘谣言’的内容，就没法有效地批判，就没法有效地消毒，群众都在云里雾中，怎么提高认识，怎么进一步揭发。因而，会议只是造造声势，没有任何效果。

第二次揭发批判会，在造反派头头李XX的要求下，把朱交待“攻击”江青的小道消息向与会者公布，有如下三点内容：1，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当演员，名字叫蓝萍，已经结过两次婚。2，样板戏的三突出实际上是要突出江青。3，江青在延安时和主席结婚，中央有一个规定，就是江青不准参与政治。其实，这样的传闻在私下早有很多人知道，只有像施XX这样幼稚犯傻且对党愚忠的人，去向‘组织’汇报。会议就这三点集中火力穷追朱的消息来源，如果她交不出消息来源，她就是‘谣言’的制造者，那就要被定为现行反革命，有可能要坐牢或判

处死刑。朱交待，这几条消息都是在清华的一个小报上看到的。会上追问是什么小报，要她拿出证据。朱答应周末回家去清华（她丈夫是清华的教员）把证据找到，下周带来。如果拿不出证据，她可就要大难临头了。

在第三次揭发批判会上，领导小组们就没有再提消息来源。显然，朱找到了那张作为证据的小报。但是会议集中批判这三条小道消息的‘反动’性质和恶毒用心。首先，批判者断定，这些小道消息都是谣言，是阶级敌人造谣、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中伤、诋毁革命旗手江青同志的光辉形象。接着引申，传播小道消息就是传播谣言，就是为阶级敌人效力，就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诋毁革命旗手。谁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把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谁攻击革命旗手就砸烂谁的狗头。批判会上，谁的纲上的越高，谁的立场越坚定；谁的嗓门越大，谁就越革命；谁的表现越激愤，谁就越有无产阶级感情。如其说是批判，不如说是恐吓、是斗争、是枉加罪名。被批判者也只能是认罪、请罪、服罪，没有任何权利辩解，哪怕是报纸已有登载。

再一次批斗会上，会议主持人宣布，斗争有了重大突破。所谓‘突破’，实际上是朱在压力逼供下，交待了向另一个好友徐X X传播过这些小道消息。所以这次会议的矛头就指向了徐。

三结合领导小组中的造反派头头李X X态度严峻的说：“徐X X，你要老实交待。在对待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问题上，是革命派和反革命派的分水岭。”

徐是党员教师，没有多少辫子，说起话来棉里带钉：“为了维护无产阶级司令部，我听到这些小道消息，没有向任何人透露。”

“那你为什么不向组织汇报？”

“向组织汇报也是扩散。何况‘组织’是在三天两头地变，今天你是组织，明天可能他是组织。三结合之前，今天这一派自称代表组织，明天那一派自称代表组织。三结合之后，今天结合了你，明天又可能结合他，我不知道谁真正的代表‘组织’。”

李没想到碰了这么个软钉子，好不自在地说：“革命造反派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今天的三结合领导小组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产物，就是代表组织。你不相信领导小组就是不相信毛主席革命路线，反对领导小组就是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徐此后以沉默对抗，随你怎么说，就是咬紧牙关不语。会议无果而终。

据说，事后李要把朱、施、徐三人打成反革命小集团，但受到领导小组中其他两个成员的坚决反对而未达目的。可是，那些无产阶级斗士们的战斗能量就更集中地泄到朱X X一人身上。三天两头召开对朱的批斗会，斗争的火药味也越来越浓，调子很快升级到敌我矛盾，并剥夺了朱的人身自由，对她实行隔离监督审查。

一次全校召开对敌斗争大会，台上跪着二十多个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八类阶级敌人，个个头戴两尺长的高帽，胸挂几公斤重的大牌。打倒、批臭、砸烂、踏碎等暴民口号响彻云霄。几十个准阶级敌人，由手执棍棒的红卫兵押到台下前排，让他们陪斗，接受教育。朱在陪斗队伍之中，说明她还是在准阶级敌人的行列。

其后，基层单位一周半月地把朱提溜出来进行批判，校系召开批斗大会时，朱就被押送去陪批陪斗。“阶级敌人”的帽子拿在手里，你要是不老实、不服气，随时可以给你戴上，之候就会随时把你往死里整。你要是老老实实跪罪、狠批臭骂自己，暂时还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也就是说，如果你随时自泼污水、自践人格，你还可以屈辱苟活、厚颜偷生。朱X X当然也只有这样的选择，否则就只有“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了。

八年之后，四人帮被逮捕，朱XX始获解放。江青的肮脏无耻的历史和丑恶乖戾的表演也随之公诸于世。上述的所谓小道消息，无不都是事实，且有不足而无过之。

实际上江在和毛同床之前，至少结过三次婚，另和四个男人同居，私生活糜烂，被称为“公共汽车”。她的心里从不曾有过纯洁的爱，有的是毒汁盈满的罂粟花。她从少女时起就把爱情当作通向野心的途径，她把男人当作跳板与梯子，一级一级跳到了权力珠峰，最后从珠峰跌入深谷，变成一堆狗屎。

事实证明，江青搞样板戏不仅是突出自己，为了把别人的劳动成果窃为己有，还把原来的编创者们打成“反革命”，迫害致死。同时，她搜罗一帮狐群狗党，拉帮结派，把江本人吹捧为“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旗手”，不知天下还有羞耻事。

当年项英经上海特工证实江青在上海的糜烂生活，给毛写信力阻与江结婚，结果信被康生隐匿。中央大多数也反对毛江结婚，但是周恩来说，江青同志在上海地下工作中做了大量工作。中央最后通过毛江结婚，江青可以做毛夫人，但20年内不可以担任政治职务。

◇ 小胡子带出两大串

清理阶级队伍的后期，从抓死猫转向抓活猫，矛头主要指向一些造反派干将。特别是七十年代初开始的全面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很快演变成为全国性的群众斗群众的恶战，数以百万计的人遭到残酷迫害。

六九年底七零年初，在林彪的“一号命令”下，中国科技大学下迁到安徽合肥。几千人的吃喝拉撒睡无人过问，一切都乱成一团。可就是对敌斗争这根弦无时无刻不绷得紧紧。这根弦可以牵动每一个人的神经，让他们饥可以忍，寒可以耐，困可以挨，苦可以受，个个老实听遣，人人屈从发落。这就是毛所说的：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

在全校大队人马下迁之后，校专政队也押着一群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和阶级敌人嫌疑人（正在隔离审查者）从北京的“牛棚”来到合肥的下迁校址（原安徽师范学院）。当时下迁校址内的唯一教学楼一二三层都已塞满了搬运来的桌椅家具，作为监禁这些专政对象的“牛棚”只能放到教学楼的顶层四楼。不想，这顶楼给那些“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人提供了一个恰当的跳台，接二连三地发生了跳楼自杀事件。已经定案的阶级敌人要自杀无关紧要，自杀一个还可以少一个人吃饭，腾出一个空位。但是还在审查的人，如果自杀了，就可能断了深挖的线，特别是对于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案。后来工军宣队（原有军宣队，到了安徽之后又进驻了工宣队）采取措施，派人把四楼所有的窗户用钉子牢牢钉死。

不顾生活远没有安顿，放下千头万绪的事务，撒手交错复杂的问题，下迁不几天，工军宣队就集合全校师生在新校园的大操场，召开对敌斗争动员大会，落实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会上，工宣队队长做动员报告，声称516集团是“建国以来最大的反革命集团”，而高等院校是该反革命集团的大本营。于是发誓，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也要把516分子一个不漏地揪出来。队长的动员报告通过强力的高音喇叭传出震耳发聩的战斗号令。台上喷气式押着一二十个隔离审查对象，台下专政队看守着二三十个牛鬼蛇神。全场一片风声鹤唳、寒光肃杀的气氛，大有‘大敌当前，血战一场’、‘宁可错抓一千，不可漏掉一个’的势头。

据说，516集团是精干的严密的秘密组织，参加的人是经过严格挑选、真正根正苗红的

人。其主要罪行是：反军乱军，反对中央文革，反对周总理。经过大会发动，小会揭发，大字报炮轰，高音喇叭震撼，那些自誉红五类的早期造反派们个个坐卧不宁，心神不安，手足无措，人人自危。被指名道姓要求交待的人越来越多，被送到专政队去实行隔离审查的人也不断增加。

尽管，送到专政队“牛棚”去隔离审查的已经人满为患，可是516一案仍然毫无头绪。科技大学的516组织谁是头头，有多少成员，如何组织，如何和校外联系，有哪些活动等等毫无所知。正当工军宣队的头头伤脑筋、设法找出突破口的时候，又传出“牛棚”发生一起跳楼自杀事件。

四楼的窗户全被钉死了，为什么还有跳楼呢？跳楼者是科大学生中一个造反兵团的头头，细条高个，养着一小撮山羊胡子，是全校清查516的重点对象。因为工军宣队从来不叫他名字，只叫他小胡子，所以大部分外围的人也只知道小胡子这个名称。他的跳楼是乘看守人没注意时，快速冲向窗户，跃身突破玻璃，然后坠下水泥地。这一自杀事件似乎给清查运动断掉一根粗大线索，也似乎给了工军宣队一个突破口。

当天下午就召开全校大会，通报敌情，深入发动。工宣队队长通报全校已有二十多人隔离审查、敌情复杂、线索错综等情况之后，调侃地说：“小胡子还真勇敢，学得一身飞天本领，从四楼飞身破窗而下。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他很可能就是科大516的总根子。现在虽然小胡子活口变成了死口，但我们要让这个死口变成一个突破口。我们要顺藤摸瓜，乘胜揪出深藏在科技大学的每一个516分子。现在给小胡子司令（他已经封小胡子为司令了！）手下的干将和喽罗们一条出路，你们现在翻然悔悟、坦白自首，还可以得到宽大处理，否则被揪出来就没有好果子吃了。”

此后，清查运动掀起新高潮，有人坦白自首，也有人坚决否认。坦白的就必得咬人不可。你本人既是516，难道就连一个同组织的同伙也不知道吗？连介绍人也不知道吗？坦白的人本来就是自编自演，无中生有，当然被咬的人更是莫名其妙。有人顺着杆子爬，也有人坚决拒绝跳进火坑。于是，由小胡子为始端，在这两个方面引出的人，数量迅速增加。坦白自首的放在群众监督下，继续交待组织关系和参与的各项罪行活动；拒绝承认的送到专政队隔离审查。由于“牛棚”人满为患，当权者决定把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这些“死老虎”放出去，腾出空来关押516嫌疑犯。不久，两方面的人数加起来已近百人之多。

在“坦白”的队伍中不断有人提出翻案，否认自己的交待。因为“坦白”自己参加516之后，就必须交待组织关系，去咬其他无辜的人，并且要编织出各种罪行，这种“坦白”的后遗症实在吃不消。翻案后就要被送去蹬牛棚。在牛棚中的人也有架不住持久逼供的人而终于“坦白”，随后就降格为群众监督。两部分人互有交换。

在这两部分人中都有最终承受不了高压逼供而走上绝路的。在群众监督的这部分人中，由于还有一点行动自由，自杀的人数较多，自杀的方式也多样化，有投水的，有跳楼的，有卧轨的，有服毒的。而在专政队中的人，行动受到很大限制，有两起跳楼自杀，都是仿效小胡子的方式冲破窗户跳下楼的。

清查搞了近半年时间，全校三千师生不工作、不学习、不生产、不劳动，日以继夜揭发、批判、斗争，隔离监禁和群众监督近百人，被逼自杀十多人，最后什么也没查清。究竟有几个516，谁填过表，谁宣过誓，谁领衔，谁牵线，等等一概都是糊涂账。一件事也不能落实，一个人也没法定案。七一年秋，随着林彪、陈伯达出事消息传开后，这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闹剧、丑剧、恶剧终于落下了帷幕。被揪斗、被批判、被监督、被禁闭的516分子和516分子嫌疑人一风吹。但对于长期受迫害和凌辱的人没有一句道歉，被迫害致死的人没有一分抚恤。那

个吞灭了无数人的生命、扭曲了亿万的人性的共产党，依然享誉着“伟大、光荣、正确”这个永世不变的光环。

◇ 身系集中营，连年服苦役

文化大革命中，清理阶级队伍后期，在全国的政治大釜升温到一定热度、做好了意识形态铺垫之后，从六九年的下半年开始，把城市知识分子逐一驱赶到农村、工厂或兵营，名曰“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实际是不折不扣的精神炼狱和肉体苦役。

由于科技大学的军宣队是来自铁道兵部队，科大师生首先被派遣到铁道兵部队，去北京西郊房山小三线修筑铁路。劳动队伍的组织完全按部队的方式编制：班、排、连、团、师。不论是教授、讲师、助教、学生，也不论岁数是七十、四十、二十，甚至不顾男、女、伤、残，统统混合编制，大家干一样的活。将“牛鬼蛇神”和隔离审查对象平均分插到各个班排。每个连派两个士兵担任连长和政治指导员，排长和班长由军宣队指定的左派干将担任。

房山小三线铁路就是京原线，路线专门选择大山走，是根据最高指示：“要准备打仗”设计的。因此工程的主要内容就是开山洞、填山沟，成天、成月、成年与花岗岩打交道。一部分工作是风镐打洞和爆破，这由铁道兵士兵担任。我们的工作就是把炸出来的石块搬进斗车，运往要填的山谷。石块小的一个人举起扔进斗车，大的两人抬起放入斗车，再大的就要用撬杠和铁锤设法把它砸破，然后放入斗车。工作不仅高强度、超沉重，而且十分艰巨和危险。这对于体强力壮的年轻人也是非常沉重的任务，何况对于我们之中的很多妇女、体弱、残疾和老人。当时我们排里有个‘走资派’，系主任黄XX，是个六十岁出头、有严重小儿麻痹后遗症的残疾人，连平地走路都有困难，在这样刀石林立、危岩遍地的工作面负重行走，真好像是小鬼走火焰山。难以想像的是，当权者们没有一个看在眼里，没有一个人为他说话或改换一件适宜他的工作。在这里，看不到人的怜悯、同情和关怀，人心就和漫山遍野的花岗岩一样坚硬。我不知道是文化大革命使人性彻底泯灭，还是革命的烈火太旺，烧灭了起码的人道主义的同情心。此事使我至今难以释怀。

组织军事化，生活、行动也要军事化。男士一个班约十二人住一个帐篷，女士几个班合一个帐篷。每天起床号一响，迅速洗漱，十分钟就响集合号，连拉屎撒尿的时间都没有。随后列队去大伙房就餐。早餐二十分钟，很多人狼吞虎咽结束早餐，为省下一点时间去厕所方便。早餐后列队去工地，行走二十分钟。山石嶙峋、崎岖不平，深一脚、浅一脚，走不好就要摔跤。尽管很多时候走起路跌跌撞撞，还要放开嗓门高唱革命歌曲，以此表现“革命”的豪情或“被革命”的感激之情。

到了工作场所，每一个连列成一个方阵，干活之前听连指导员的训话。训话的大体内容是：

最高指示：“备战、备荒为人民”，“阶级斗争是纲，纲举目张”，“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

指导员的话：“每一块石头就是一个阶级敌人，搬走一块石头就是消灭一个阶级敌人。”“每一块大石头就是一个大炮弹，扔掉一块大石头就是向美帝国主义发射一颗大炮弹。”“每一块巨石就是一个敌人的堡垒，每砸烂一块巨石就是攻破一个敌人的堡垒。”……。

就是这么几句话，翻来覆去，每天如此，千篇一律。训导者已经被训练成重复简单话语的机器，被训导者也被训练成无话语的干活的生畜。

“阶级敌人”也好，“炮弹”也好，“堡垒”也好，都是用最原始、最笨拙的办法一块一块地去搬，一块一块地去砸。据说这样可以练就无产阶级的铁打劲骨。“花岗岩再硬硬不过无产阶级战士的决心，石头再坚坚不过无产阶级战士的意志”。或如果有人提出什么技术革新方案，不但不会考虑，很可能会受到批判，说你是资产阶级技术挂帅。“宁要革命化，不要机械化”。可悲的是，铁打劲骨没有练就，却不断有人砸断手指或脚趾，甚至砸断臂骨或腿骨。更惨的是，部队的工地医院只有拿手的锯骨技术，凡有骨损、骨折、骨裂、骨碎等工伤，二话不说，拿起锯子就给你锯掉手指或脚趾，乃至手臂或脚腿。造成的终生残废，国家不会给你一分钱的抚恤。当时我们排中就有一人右手有两个手指因石块砸伤而被截，另外一人的脚背和脚趾被砸伤而失去了一个脚大拇指。

一天沉重劳动，精疲力尽，腰如佝偻、腿若沉铅，收工后仍然要列队、高唱革命歌曲回营。三十分钟的晚饭、洗涮和方便，接着便是两个小时的政治学习。一般是以班为单位，十五六个人坐在帐篷内的行军铺上，学习“最高指示”或报纸社论，狠批帝修反；谈劳动改造思想，深挖私字一闪念；揭发牛鬼蛇神不老实表现，狠狠批斗阶级敌人。总之再一次绷一绷阶级斗争的弦，紧一紧无产阶级专政的紧箍咒，充一充“革命化”的电。这种“阶级斗争”的实践确实获得了巨大的成效：在极端艰苦的生活中完全消灭了人的苦难意识；在完全监禁的生活环境下彻底消灭了你的自由意识；在受到生畜一样的对待时完全消灭了你的人格意识。

由于林彪的“一号命令”，科技大学七零年初全部下迁到安徽合肥。四个月的山区修筑铁路的苦役宣告结束。

在我们下迁到安徽之前，我的妻子已经随她的单位去湖北“五七干校”。当时我们有一个两岁半和一个才几个月的两个孩子，妻子把大孩安排在全托托儿所内，把小的送到老家安徽舒城，请奶奶喂养。下迁时只能由我一手牵着老大，一手提着行李，仓惶狼狈带到合肥。其状况让我想起三十多年以前我在两岁时，由父母亲带着我逃日本时的情景。

幸运的是，我的老家舒城离下迁地合肥不远，且家中还有个奶奶，我只好又把大孩子送回老家，让奶奶劳累了。在我庆幸自己有此方便条件时，我也为那些无此条件的家长们，在这毫无人性关怀的社会环境下，困于处置他们幼小子女而感到悲哀。

在下迁校址内，经过乱糟糟、糊涂涂的近半年清查516斗争，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苦役。因为我校的工宣队是从淮南煤矿派来的，自然师生们就被组织去淮南煤矿挖煤。

组织仍然是军事化的形式。我们连的近百十来人被派往淮南的谢一矿。二十几个人住一个简陋的车间大屋子，统铺中每人只有两尺宽空间。除了下煤井挖煤，去食堂吃饭，绝大部分时间就在这厂房式的大屋子的统铺上度过。它既是睡觉的场所，也是政治学习场所，阶级斗争场所，思想改造场所。没有书读（除了“红宝书”），没有音乐娱乐，更没有广播电视，连写封家信、说句私房话的条件都没有。人成了一部机器，一部可以听使唤、输虔诚的机器。其境况只有在描写纳粹集中营的电影中才有可能看到。

煤矿下井分三班，每班八个小时，二十四小时不停工。我们三个排也分三班下井，相互几呼见不到面。和在房山筑铁路一样，不分男女老幼、体弱残疾，一律下井干同样的活。比起房山工地一片狼牙锯齿的花岗岩世界，井下的工作环境更为恶劣。除了头顶上的小小一盏矿灯照亮的前方一小片亮处之外，都是一片黑暗。脚下除了有铁轨整木之外到处都是煤渣石块，有些地方还有大片积水，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情况。

井下的工作分掘进和采煤两类。掘进是打眼放炮、支撑坑道和运走石渣；采煤是用镐头刨

松煤层，用铁掀把煤装进斗车，运到特定的地点。我们大部分时间是干采煤的活，有时也去掘进工作面帮助运石渣。

每天上班时先穿上准备在煤层跌打滚爬的工作服，领来矿帽和矿灯，穿戴好之后坐上缆车，经过一千多米的斜井直到指定的工作层，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坑道内高一脚低一脚地再走上几千米，才可到达工作面。镐头掘煤，铁掀铲煤，斗车运煤，在黑暗、污浊、潮湿、缺氧的环境下，八个小时工作下来，精疲力尽，腰疼臂痛，无话语、无谈笑，只有默默的忍受。第一次从井下出来，相互看见对方满头满脸黑炭染成黑鬼一样，觉得可笑。到了政治学习发言时又多了一个说辞：虽脸染黑了，可心炼红了。下班之后去澡堂清洗，澡池里的水比阴沟水还脏，又黑又臭，简直令人作呕。思想改造交流心得时也多出一个说辞：在煤矿工人的澡池里，洗掉的是资产阶级肮脏思想，练就的是无产阶级感情。随着在煤矿劳动时日的增加，逐渐听到本矿井和临近矿井传来的矿难事故，于是政治学习中就经常听到：深挖私字一闪念，狠批胆小怕死的心里，坚决向党表决心，学习煤矿工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如此，在当时资讯极其闭塞、官方有意封锁消息的情况下流传出来的大大小小的煤矿伤亡事故，轻而易举地在政治挂帅和阶级斗争的高热蒸汽下消融得无影无踪。

四个月的煤矿井下劳动，加上远离城市、远离家庭，几乎忘记了伤痛、灭绝了思考，在这集中营式的政治高压釜中，这批知识分子已经被蒸煮、改造成像那脱水的软木塞，塞到什么样的瓶口，填进什么样的缝隙，都会毫无反弹地乖乖顺从，服服帖帖就位，以至于在年终时，工宣队宣布从煤矿班师回校时，人们都干瘪得没有一丝兴奋之情了。

根据毛的“五七指示”：既要学军，还要学工、学农，还要批判资产阶级。筑铁路和下矿井可以说是“学军”和“学工”了。新年和春节刚过，又要派发老九们去农场“学农”了。我匆匆重新安排了两个孩子，轻装上阵去‘学农’。

敞篷大卡车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颠簸，把我们分别送到一个公社的各个生产大队。仍然是军事化形式组织，一个生产大队，一个连。我们连的所在地叫范岗大队，主要种植大粮作物，另外有部分蔬菜和奶牛。这次，我们的宿营之地是真正的牛棚，据说原来是饲养奶牛的地方，特地为我们腾出来的。干打垒土墙，门窗只是留出来的空洞，没有门框和窗框，更没有门板和窗玻璃。屋顶是篾珊上铺盖一层茅草，地面是坑洼不平、带有浓烈牛粪气味的褐色土地。地上铺了厚厚一层稻草，供大家做地铺。按照班排顺序点名，一一扛行李进屋，打开铺盖卷，一个紧挨一个铺开各自的铺位。就好像囚犯被押解到驻地，按号在指定的位置安置囚铺。只是工军宣队没有给每个人编一个囚号而已。八十来人，分里外两排，排满三十来米长的大牛棚。女士们就住在和牛棚相连的牲口饲料库。

起初一个多月的工作就是修水渠。每人一把铁掀，在渠底挖土，一铲一铲扔到堤埂上，开出一条两米宽、两米深的主干渠。开始大家觉得比筑铁路、挖煤矿要轻松许多，干活时也可以有点说笑。可是时间一长，感觉就不是那么回事了。由于动作单调，姿势和用力都是不断重复，很快手心生出大血泡，臂膀和腰背的疼痛越来越加剧。一天下来，大部分人手上的血泡都已磨破，疼痛钻心。没有人宣说，至多和邻近的人小声交换一下，互相看看手掌。因为牵涉到接受‘再教育’的态度，看你是否决心

“磨一手老茧”“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人人都是默默的忍受，咬牙顶过钻心的疼痛。

开头几天，由于白天过于劳累，尽管地下阴冷潮湿，牛棚里的鼾声此起彼伏，大家都还能一夜熟睡。几天之后，手中的血泡开始转变为老茧，臂膀疼痛稍有缓解，然而睡觉却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一个人首先发现了虱子，很快，人人都说有虱子。虽经一天精疲力尽的沉重劳动，

晚间却辗转反侧，不得入睡，或是夜间醒来就再也无法入眠。人们开始在钻入被窝之前脱下自己的内衣，在昏暗的灯光下抓虱子，或者劳动打歇时偎在堤埂上，在太阳下翻开身上的衣服抓虱子。此景很有些像动物园里的猴群，只是抓到的虱子没有送到嘴里去，而是用两个指甲盖把它碾死。不过，一不小心，抓到的虱子还未碾死又让它逃之夭夭了。有同事打诨说：“虱子比人的本事大的多，攥在手中心也会跑得无影无踪”。此话有谕今之嫌，说虱子比人的本事大，是哀叹当今的人，谁也无法逃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好在这次对虱子的议论非常踊跃，大家就虱子论虱子，尚未引起什么政治灾难。

有人说，虱子就是跳蚤，跳蚤是世界上跳得最高的动物，它可以跳到自身尺寸的五百至六百倍，应该登上吉尼斯世界纪录。如果人也能跳得如此比例，可以轻而易举地跳上帝国大厦的尖顶，跳过英吉利海峡。

也有人说，虱子是世界上最能挨饿的动物。如果你的衣服带着虱子收藏到箱子里，一年以后拿出来穿，它照样还要吸你的血。这也可以上吉尼斯纪录。

还有人说，虱子是世界上最难消灭的动物。它寄生在动物和人身上，深藏在动物的毛皮里，人的头发、阴毛和内衣里，不能喷撒敌敌畏，更不能开水烫、烈火烧，只能一个一个捉。诸位回家只有脑袋剃光头，衣服高压锅煮，才可断其繁衍。

这些老九对虱子评头品足，见仁见智，可是谁也不提这虱子是来自牛棚，更不敢提出请求换一个地方住。那么，虱子之灾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了。

初春季节，常有连天阴雨，到处都是烂泥路，行走十分困难，挖土更是事倍功半。这时就让大家在驻地牛棚搓草绳。人们把自己的铺盖卷起来，从谷场上的大草堆运来大量新稻草，经过农民的讲解和示范，每个人就坐在自己的铺盖卷上搓起草绳。和挖土只要出力不一样，搓草绳还要一点技术。很快，手脚灵巧、动作麻利的人就显出优势。有的人一个小时能搓出几十米，质量优异。也有的人一小时搓出几米，松松垮垮。每天劳动收工时，连长总要总结一下一天的战斗成果。挖水渠只统计全连挖了多少方土，并没有算计每个人的土方。搓草绳的成果是根据每个人上报的数字来统计。每人用两只手臂来丈量自己搓出的草绳有多少榻，每一榻大约1。8米。结果，最多的朱XX有二百多榻，最少的黄XX只有三十几榻。凑巧得很，朱和黄两人都出在我们排，而且前者是出身黑五类，经常运动被整；后者出身红五类，是个革命大左派。

晚饭后，以排为单位在地铺上政治学习，座谈劳动中的思想改造收获，这次搓草绳的统计，就成了老九们对“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一次大升华。

有人发言，引用毛的话“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指出，干革命不是凭技能，而是凭的一颗对革命的赤胆忠心。干革命“宁要无产阶级一根草，不要资产阶级一根苗”。

有的人发言狠批资产阶级法权，指出，技术有高低，能力有强弱，无产阶级革命不能讲价钱。记工分要干，不记工分也要干。有报酬要干，没有报酬也要干。红军长征时，不但没有报酬，还有掉脑袋的危险。持技术、讲报酬就是资产阶级法权。

还有人引用毛的话：“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说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否则随时都可能复辟资本主义。

还有人发言说，现在我才真正认识到‘按劳分配’就是资产阶级法权。如果不打破这一法权，朱X X的报酬就会比黄X X的报酬大上近十倍，这不是极端荒唐的吗！

真正荒唐的是，这样的‘政治学习’大长了‘无产阶级一颗草’、一天生产三十榻草绳的黄X X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一根苗’、一天生产二百榻的朱X X的‘气焰’。

开始到了春耕、春种季节。耕田使用水牛和犁耙，这是当地农民干的活；我们的劳动内容主要是早稻插秧。初春乍暖还寒。插秧时要把裤腿卷到大腿根，浸泡在齐膝盖的冰水和稀泥里。不问年轻妇女是否在例假期，也不问年岁长者是否有腰痛或是脊椎损伤，让你下田插秧没二话。

插秧既要体力又要技巧。手脚麻利的人和笨拙的人差别很大。但前者接受搓草绳的经验教训，不作人先，不落人后，以求保平安。可是插秧的质量一眼就可看出高低。有的人插出的秧苗株距相等，行行标齐，分株大小适当，插土深浅适宜。而有的人插的秧苗东倒西歪，参差不齐，株距大小不一，株束粗细不等。生产队质量监督员看到这种情况时，就会来帮助你纠正或重新调配你的工作。午饭之后，朱X X因为秧苗插的很标准，因而被调到样板田去；而黄X X插的秧苗实在差劲，监督员只好调他去加入挑秧把。挑秧把也不是一件容易的活。从育秧的苗圃到插秧的大田有一二百米，挑起一百多斤水淋淋的担子，走在一尺宽的田埂上，搞不好就会滑跌到水田里。果然不出所料，黄挑了第一趟就已摔得满身满头的泥水。我心里暗自思忖，这次看看那些善于顺杆爬的老九们如何用资产阶级法权去为黄开拓了。

插秧工作最吃力的腰背，一天下来，人人弓着腰，个个抚摸着背。而挑秧把最难受的地方是肩膀，一天挑下来，肩膀很可能要脱皮。人人都有疼处，个个要吃苦头。皮肉吃苦，咬咬牙可以挺过去；脱皮起茧，过些日子可以恢复。可是精神的扭曲乃至死亡，是难以治愈的。每当政治学习时，那些老九食客们总能找到一套说词，或无聊吹捧，或顺杆发挥，或谄媚献忠，或浅薄学舌，完全丧失个人人格和耻辱意识。这也正是老毛要实现的目标，利用高压锅式的集中营生活，消灭所有知识分子的群体思维和个人人格。在如此社会环境下，你是万万也逃脱不了的。不同的是，有的人是自觉地顺着杆子爬，自甘于人格的死亡；而另外一些人始终保持着心灵深处一块圣洁的天地。吃怎么样的苦、受什么样的罪、经再大的狂风暴雨、过再黑暗的鬼门，都不会玷污和放弃自己心里头那块圣洁的天地。

春耕春种结束之后，七二年四月我们被调遣回学校，据说是为了准备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大家都认为，大学教育已经终止六年了（这是古今中外的奇迹！），该恢复我们教育工作的本行了。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只是继续在沉重的体力苦役和高压政治斗争的同时增加一点对工农兵学员的教学工作。实际上，所谓教学工作，只不过是给工农兵学员补习一点文化课，用不了十分之一的时间，百分之九十时间还是用在服劳役和‘政治学习’上。

一直持续到四人帮倒台，我们服劳役时间最长、最没有意义的是，在毛的“深挖洞，广集粮，不称霸”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下，五年之久在校园内的挖地洞。挖地洞只剩下教职员，因为老的学生已经离开学校，新的工农兵学员无需劳动改造。

男女混合、老青搭配，八人组成一个班，每天四个小时下井挖洞。八人中留两人在地上，一般是女士或老弱，操作缆车和准备水泥砖块，其余六人一个一个地用缆车吊到二十几米深的井下。两人挖掘，两人运土，两人砌砖。尽管是科技大学，挖地洞用的是最简单、最原始的办法。因为机械化会影响革命化，最原始才最革命。

当时科大挖的地道只有1.6米宽，2米高，平时不可能派上任何用场。用比豆腐渣好不

了多少的红专和低劣水泥砌成的内壁，经常有坍塌事故，砸伤压坏人的事时有发生。可是在那事事讲“革命”、人命如草芥的年代，只能是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伤愈再上火线；砸死了，死得其所。

尽管五年来在校园地下挖出如蜘蛛网似的不知多少地道，不但平时毫无用处，还要给地面建筑造成极大的隐患。若真的打仗，除非回到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地道战，这些坑道没有任何使用价值。深挖洞，广折腾，其真实的目的就是通过无休无止的苦役，辱尊严，毁人格，灭人性。名为“备战、备荒、为人民”，实则“整人、整民、为邪灵”。

十年文化大革命，老九们是一半时间是在群众斗群众的血腥政治残杀中煎熬，一半时间是在沉重的肉体苦役中挣扎。尽管没有枪械武器，没有脚镣铁链，也没有狱警岗哨，可是人人都生活在无限恐惧之中，个个都诚惶诚恐不可终日。斗来斗去，基本上已经是‘洪洞县里没好人’了。很多知识分子被扭曲了人性，窒息了智慧，泯灭了尊严。有多少青春被白白耗尽，有多少才华被无缘无故毁灭，有多少睿智被野蛮地埋葬，更有多少无辜生命被活生生涂炭。这是大面积野蛮血腥残杀的年代，是彻底毁灭中华文化的年代，是疯狂剿灭人性的年代，是全面荼毒中华民族的年代。谁是灾难的根源？谁是罪恶的祸首？历史不是早已明明白白昭示人间了吗！

□ 节选自韩杰生：《往事烟消云不散》，标题为编者所加

【往事如烟】

毛泽东逝世岁月亲历记

· 楚 文 ·

1976年——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最后一年，也是中国政坛的多事之年。尽管当时我还是一个未谙世事的少年，但这一年中国政坛发生的桩桩大事，都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其中，印象最为深刻的，莫过于“中国人民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毛泽东的逝世。

毛是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逝世的，但消息传到民间是下午4点钟的事。那一震惊中国的消息传来时的情景，至今回想起来，我还历历在目。那天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我正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毛时代不存在学生学习负担重的问题，今天的“减负”一词无从听说。我当时就读的小学下午是1点半钟上课，整个下午只有一节读报课再加上一节正课，所以3点多钟学校就放学了。放学后，我和几个同学一路上慢悠悠地走着，走在我前面的一拨同学在抄近路回家途经农民家门前时（我家当时住在城乡结合部的郊区），听到了从农民家的广播里传来毛逝世的消息（毛时代为了加强对农村的舆论宣传和控制，在大多数农村都还没有用上电灯的情况下，家家户户却几乎都普及了有线广播）。我赶上了走在我前面的同学后，一经常和我在一起玩耍的儿时伙伴神秘兮兮地告诉我说，他刚从农民家的广播里听到了有重要人物死了的消息。好奇的我立即追问是什么重要的人物死了，他吞吞吐吐，最后竟称因害怕而不敢讲出。他的这种在我当时看来纯粹是“吊胃口”和“卖关子”的行为，令我十分恼火。我情急之下用一句粗话骂了他，并责问他有什么东西好害怕的。不过，从他紧张的表情和吞吞吐吐的言辞中，我也猜想到了可能是毛死了。今天回想起来，那位儿时伙伴的害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如果毛确实死了，你说毛死了，到也无碍；如果毛并没有死，而是你的耳朵听错了，你却在这里说毛死了，那可是吃不了兜着走，轻则挨批，重则入狱。只要是亲身经历过中国十年“文革”浩劫的人，大概都不会认为我在这里夸大其辞或危言耸听。

过了没多久，我居住的居民区的大广播响起来了，从广播里确信无疑地传来了毛逝世的惊人消息，广播里反复播出《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名单》和《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公告》，大家屏住气息全神倾听着广播里传来的一字一句。当时，整个居民区的气氛陡然变得凝重起来。

第二天去上学，学校理所当然地宣布停课。我当时就读的是一所国有企业下属的子弟学校，老师接上面通知，将我们列队拉到了该国有企业的大礼堂开会——同企业的职工一起悼念毛。大礼堂的主席台上方悬挂着毛的巨幅画像，画像下面摆放着苍翠的柏树枝和纸扎的簇簇白花。会议的主要仪式是：大家有秩序地列着队，轮流经过主席台的毛画像前，向毛行三鞠躬礼。很多人在毛画像前泣不成声，我也情不自禁地流下了两行清泪。

毛逝世时，很多中国人都哭了。这种哭有很复杂的原因，当然大多数可能是出于对毛的深厚感情，这种感情有质朴性，有长期个人崇拜氛围下形成的盲目性。也有不少的人是出于当时那种政治高压下的恐惧，为了表白自己对毛纯洁不二的无产阶级感情不得已而哭之。这种哭，不是发自内心，而是哭给别人看的。有人实在哭不出的，就用手使劲地将眼睛揉红，以表明自己哭过。“文革”结束后，我就曾听说过，有地方因有人在毛逝世时没有哭而受到政治追查和政治迫害。我当时的哭不排除有几分真诚，但基本上属于不得已，我本来就出身于“黑五类”家庭，在这个时候通过哭来表现一下自己积极的革命立场是很有必要的。尽管当时我还年少，但那种严酷的政治岁月给了我这种自我保护的政治本能。由于行鞠躬礼的长龙般的队伍移动缓慢，会议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散会后，大家都有种身心疲惫的感觉。然而，没有想到的是，这仅仅是漫长而又繁缛的悼念活动的开始。

官方广播在播发毛逝世消息的同时，还播发了悼念活动期间全国停止一切娱乐活动的通知。说句老实话，在中国经济几乎到达崩溃边缘的“文革”年代，连最基本的衣食温饱都尚未得到解决的老百姓，是谈不上有什么娱乐活动的。我记得当时城市里面能够称得上娱乐场所的，可能就是经常放映八个样板戏的电影院。因而，当时电影院一律关闭。

但没过多久，电影院又纷纷开放了，里面放映的都是北京传来的悼念毛的新闻纪录片，观看这些纪录片成为当时指定的一项政治任务。在毛逝世的日子里，我第一次有幸知道和看到了电视。当时，我父母所在的国有企业，为了让大家都能够收看到北京和全国各地悼念毛的活动，特意购买了一台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晚上摆放在露天的篮球场里，组织大家观看。电视机的收视效果非常糟糕，屏幕不停地闪烁，但大家毕竟是第一次接触这稀罕物，所以都有种新鲜和兴奋的感觉。当时民间老百姓的娱乐活动主要是玩扑克，我记得父亲几乎每天都要和邻居们玩扑克（当然那时候不可能也不敢带有赌博赢利的色彩，输赢者只是玩玩钻桌子的游戏），但在这个时候大家都自觉地不再玩扑克了。这种自觉，与其说是对毛的敬重，还不如说是对当时高压政治的恐惧。如果谁家有留声机的话，也不能播放音乐了。离我家不远的居民区的一个医生，用家里的留声机播放用俄语解说的有关诊断学的一张片子，引来了居委会的好几个警觉的马列老太太，她们敲开该医生家的门，警告他在这非常时期要“检点”自己的行为，吓得这位医生赶紧把留声机“雪藏”起来。当时全中国不停地反复播放的唯一音乐，就是低沉的哀乐。我今天能够将哀乐完整地随口哼唱出来，就是因为在那个时候听得太多了。悼念活动期间，民间所有的婚庆活动也都停止了，且长达一个月之久——从9月9日到10月9日。当时我家隔壁有一对新人已预定10月1日“国庆节”举行婚礼，因毛逝世而不得不推迟到10月10日举行。

毛的逝世，可以说创造了众多的世界之最。比如，为毛佩带黑纱的人数之众，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死者都无法享受的殊荣。当时几乎人人佩带黑纱，而且佩带的时间有的长达一月之久。当然，绝大多数中国人不可能在9月9日这一天就佩带了，但摘下黑纱的时间却几乎都是在1

0月9日悼念活动结束的这一天。当时中国出现的灵堂之多，毫无疑问地也是世界之最。在我生活的这座城市，几乎中型以上的国有企业都为毛设了灵堂，而且24小时有民兵轮流持枪站岗，为毛守灵。灵堂里摆放的花圈，好像是攀比似的，一个企业比一个企业做得精致、漂亮。在悼念活动结束后，我所在城市的博物馆还举行了一次花圈展览，就是将国有企业做的花圈集中起来供人参观，花花绿绿的一大堆花圈摆放在博物馆里，令人眼花缭乱。参加毛追悼大会的人数，理所当然地也创造了世界之最。追悼大会于9月18日下午3时举行，主会场设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全国各个省、市、县甚至更低一级的行政单位包括部队、厂矿、学校、医院，都设立了分会场。记得追悼大会举行的当天下午，天气异常炎热，我和同学们列对站在学校的大操场里，通过广播收听北京传来的追悼大会的实况。在赤热而又毒烈的太阳曝晒下，有不少同学中暑倒下。后来，从市里的主会场（相对于学校分会场而言），也不断传来有人中暑倒下的消息。那天下午，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商店关门，中国历史上可能从来没有如此万人空巷过。这是不是又创造了一个世界之最？

在毛逝世的二十多年后，我和一位同样有着自由主义信仰的挚友，经常就皇权政治和僭主政治哪个更坏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我的这位朋友坚持认为，皇权政治是人类历史上最坏、最残暴的政治。有一次他从北京出差回来，迫不及待地告诉我：“你去看看北京的十三陵吧！你只有亲眼看到了十三陵工程的浩大，你就会感觉到皇权政治有多么的坏。”我说毛逝世的悼念活动所耗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之巨，不要说建一个十三陵，就是建上十个十三陵也是绰绰有余的。毛的丧事可谓空前绝后、极尽哀荣，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专制皇帝都不可能望其项背。无怪乎法国思想家贡当斯在比较僭主政治和君主制后曾说：“我当然不是专制制度的信徒，但如果让我在僭主政治和稳定的专制制度之间进行选择，我会奇怪为何不选择后者”。历史的经验也证明，僭主政治往往比君主制更坏、更残暴，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也更大。

就在毛逝世二十年后的1997年2月19日，中共的又一位顶级人物邓小平逝世。邓逝世的消息传来后，民间表现出异常的平静。上班的照旧上班，上学的依旧上学，娱乐的仍然娱乐，人们的日常生活没有因此而受到冲击。唯一受到影响的是中国的股市，邓逝世消息传来的当天上午中国沪、深两地的股市急速下挫，但下午即出现了强劲回升。平心而论，同毛时代相比，这确实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中共在其“十六大”后积极倡导政治文明，而走向政治文明的实质就是把中国由一个极权政治社会变成一个人本主义的平民化的社会。这样的社会离我们还远吗？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